

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基于 CGSS 2021 的实证研究

于文丽^{1#} 牛雨谣^{2#*} 王一诺³ 葛蒲⁴ 张明晓⁵ 李奇遇⁶

(¹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²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41, ³北京大学, 北京 100191, ⁴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⁵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2500, ⁶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22)

摘要: 目的: 探究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

方法: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21 年数据, 筛选出 227 名大学生样本。控制性别、年龄、民族、学段、高中背景、高校层级、专业类别及家庭经济状况, 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 分别将英语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作为因变量, 评估了二者与父亲教育水平、母亲教育水平的关联强度。

结果: 回归分析显示, 父亲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力 (OR=1.52, $P=0.007$) 和口语能力 (OR=1.45, $P=0.015$) 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母亲教育水平对大学生听说能力的影响未达统计显著水平 (听力: $P=0.822$; 口语: $P=0.529$)。专科生的英语听力 (OR=0.16, $P<0.001$) 和口语能力 (OR=0.24, $P<0.001$) 均不如本科生。

结论: 本研究证实, 父亲较高教育水平显著提升高校在读生英语听说能力, 母亲教育水平影响不显著; 本科生听说能力显著优于专科生。该结果提示: 应基于智能教学平台, 将家庭文化资本差异与院校层级特征纳入数字化学情档案, 通过自适应技术为专科生及家庭资源不足学生提供个性化听说训练路径, 倾斜资源支持薄弱群体。研究为构建数据驱动的公平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依据, 揭示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 对教育公平与外语人才培养具有新启示。

关键词: 父母教育水平; 英语听说能力; CGSS 2021; 大学生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49

1 前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向纵深发展以及数字人文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 英语听说能力已超越传统语言技能范畴, 成为大学生参与国际科研合作、跨境文化交流和全球就业竞争的核心素养^[1]。依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要求,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者应具备“用英语有效进行社会交际和学术交流”的能力。然而, 我国大学生群体仍深陷“聋哑英语”的结构性困境。基于全国性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 仅有不足 5% 的国民能实现英语无障碍听说^[2]。这种能力上的失衡不仅限制了个体的职业发展潜力 (例如减少了在外企的就业机会), 更与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高层次人才”战略目标存在显著差距。

尽管已有研究尝试探讨影响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的相关因素, 但在理论视角与实证深度上仍存在以下三方面显著局限: 第一, 研究重心多聚焦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与家庭影响, 忽视了大学阶段作为“文化资本自主积累的过渡期”所具有的复杂性; 第二, 相关分析通常将英语能力作为一项整体指标, 未能区分听力 (输入性技能) 与口语 (产出性技能) 的分化机制; 第三, 父母教育水平虽被广泛用作文化资本的代理指标, 但其在代际传递中的性别化作用路径 (即父亲与母亲教育资本的影响差异) 尚缺乏系统检验。

本研究借助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进一步深化该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形态存在: 制度化资本 (如学历证书、学术资历)、具体化资本 (如文化藏品、教育资源) 与内化为生活习惯的文化素养。其中, 制度化文化资本更易获得教育体系认可与转化优势。在大学这一场域中, 对语言能力的评

价与回馈机制高度制度化,因此,父亲作为社会现状下家庭中通常掌控资源配置与外部拓展机会的主要角色,其教育资本更可能通过“制度化通道”(如海外交流、外语竞赛、国际课程等)影响子女英语能力,具备高等教育背景的父母更擅于识别优质语言教育机会(如国际暑期学校、在线外教课程),并通过经济资本转化实现选择性投入^[5]。而母亲教育资本则多表现为“生活化惯习”的传递,如早期语言陪伴、文化兴趣启蒙等,其影响力可能随子女进入独立教育环境而边际递减。这种文化资本的代际转移虽在基础教育阶段被部分证实^[6],但在高等教育的关键期,即大学生脱离原生家庭但尚未完成文化资本自主积累的过渡阶段,相关的实证研究仍存在空白。

本研究致力于解析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如何通过不同形态(制度化与生活化)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产生差异化影响的机制。聚焦核心问题:父母教育水平如何分别塑造在读大学生的英语听力能力与口语能力?基于CGSS2021数据库筛选的本专科生样本,构建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听力能力与口语能力作为独立因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民族、院校层次、高中背景、专业类别及家庭经济状况等潜在混杂因素的基础上,系统检验父母教育层级对两项语言子能力的独立效应。研究成果将为破解“聋哑英语”困境提供关键认知突破:揭示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听力能力与口语能力的差异化代际传递路径,并探明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群体在听说能力维度的特异性薄弱环节分布,为理解家庭文化资本在语言习得中的选择性渗透提供实证基准。

2 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于2021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CGSS始于2003年,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该调查以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运用面访模式对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信息进行连续性截面调查。CGSS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100个县级单位和5个大都市,具有良好的代表性。CGSS2021数据覆盖19个省320个社区,有效样本8148个(56.14%来自城镇,45.15%为男性,平均年龄51.6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20年,73.07%已婚)^[7]。本研究以在读本专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后,最终得到227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构建

2.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将受访者自评的英语听力与口语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这两项均源自CGSS2021问卷中对语言能力的主观评价项。

2.2.1.1 英语听力水平

本研究采用“您觉得自己听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这一题项作为被解释变量英语听力水平的测量依据,该原始变量包含五级序次选项(1=完全听不懂,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很好)。为兼顾能力状态的连续性与分类解释力,将选项重构为三类有序变量:“差”(含“完全听不懂”与“比较差”)、“中”(对应“一般”)、“好”(含“比较好”与“很好”)。

2.2.1.2 英语口语水平

本研究采用“您觉得自己说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这一题项作为被解释变量英语口语水平的测量依据,该原始变量包含五级序次选项(1=完全不能说,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很好)。为兼顾能力状态的连续性与分类解释力,将选项重构为三类有序变量:“差”(含“完全不能说”与“比较差”)、“中”(对应“一般”)、“好”(含“比较好”与“很好”)。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取CGSS2021问卷中父母教育水平的相关问题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相关的两道题目为:“您父亲/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原始变量采用十三级分类选项(1=没有受过任何教育,2=私塾/扫盲班,3=小学,4=初中,5=职高,6=普高,7=中专,8=技校,9=成教大专,10=全日制大专,11=成教本科,12=全日制本科,13=研究生)。为提升类别解释力并符合中国教育体系层级特征,将其重构为五类有序变量:“1=小学及以下”(含原始1-3类)、“2=初中”(对应原始4类)、“3=高中阶段教育”(合并原始5-8类)、“4=大专”(整合原始9-10类)、“5=本科及以上”(涵盖原始11-13类)。

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在回归模型中控制八类潜在混杂变量: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男性,女性)、年龄(连续变量)、民

族（汉族，少数民族）；教育背景涵盖在读学段（大专，本科）、是否毕业于省级重点高中（是，否）、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是，否）；专业与经济因素包含所学专业类别（理工农医，非理工农医）及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用均数 $\pm$ 标准差描述。分别运用单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和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父母教育水平对在读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 $\alpha=0.05$ 。

3 结果

3.1 受访者的一般特征

227 名受访者年龄范围为 18-25 岁，年龄均数 $\pm$ 标准差为 20.56 $\pm$ 1.323，受访者其余一般特征详见表 1。

表 1 受访者一般情况及英语听说能力

变量	n (%)	变量	n (%)
性别		母亲学历	
男性	104 (45.81)	小学及以下	67 (29.52)
女性	123 (54.19)	初中	70 (30.84)
民族		高中阶段教育	51 (22.47)
汉族	199 (87.67)	大专	19 (8.37)
少数民族	28 (12.33)	本科及以上	20 (8.81)
在读学段		家庭经济状况	
大专	43 (18.94)	低于当地平均水平	43 (18.94)
本科	184 (81.06)	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	184 (81.06)
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		英语听力水平	
是	36 (15.86)	差	69 (30.40)
否	191 (84.14)	中	110 (48.45)
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 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		好	48 (21.15)
是	18 (7.93)	英语口语水平	
否	209 (92.07)	差	93 (40.97)
专业		中	100 (44.05)
理工农医	140 (61.67)	好	34 (14.98)
非理工农医	87 (38.33)		
父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	38 (16.74)		
初中	87 (38.33)		
高中阶段教育	55 (24.23)		
大专	23 (10.13)		
本科及以上	24 (10.57)		

3.2 受访者的英语听说能力现状及单因素分析结果

受访者英语听说能力现状详见表 1，单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显示，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与性别、在读学段、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父亲学历、母亲学历有关；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与性别、在读学段、父亲学历、母亲学历有关（见表 2 及表 3）。

表 2 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相关因素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单因素	多因素
----	-----	-----

	β	S.E	t	P	OR(95%CI)	β	S.E	t	P	OR(95%CI)
性别 (以男性为参照组)										
女性	0.55	0.25	2.18	0.029	1.74 (1.06 ~ 2.86)	0.43	0.28	1.56	0.118	1.54 (0.90 ~ 2.66)
民族 (以汉族为参照组)										
少数民族	0.50	0.39	1.29	0.197	1.65 (0.77 ~ 3.53)	0.71	0.41	1.72	0.085	2.03 (0.91 ~ 4.57)
在读学段 (以本科为参照组)										
大专	-2.13	0.37	-5.72	<0.001	0.12 (0.06 ~ 0.25)	-1.84	0.39	-4.73	<0.001	0.16 (0.07 ~ 0.34)
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 (以否为参照组)										
是	0.74	0.35	2.12	0.034	2.09 (1.06 ~ 4.12)	0.17	0.39	0.43	0.667	1.18 (0.55 ~ 2.51)
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 (以否为参照组)										
是	1.11	0.48	2.32	0.020	3.03 (1.19 ~ 7.76)	0.31	0.55	0.56	0.574	1.36 (0.46 ~ 4.04)
专业 (以非理工农医为参照组)										
理工农医	-0.15	0.26	-0.59	0.556	0.86 (0.52 ~ 1.42)	-0.02	0.28	-0.06	0.955	0.98 (0.56 ~ 1.72)
家庭经济状况 (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为参照组)										
当地平均水平或以上	0.15	0.32	0.47	0.635	1.16 (0.62 ~ 2.17)	-0.02	0.34	-0.06	0.954	0.98 (0.50 ~ 1.91)
父亲学历	0.52	0.11	4.67	<0.001	1.68 (1.35 ~ 2.09)	0.42	0.15	2.69	0.007	1.52 (1.12 ~ 2.05)
母亲学历	0.35	0.10	3.36	<0.001	1.42 (1.16 ~ 1.75)	-0.03	0.14	-0.23	0.822	0.97 (0.73 ~ 1.28)
年龄	0.01	0.09	0.16	0.874	1.01 (0.85 ~ 1.21)	-0.00	0.10	-0.02	0.980	1.00 (0.82 ~ 1.21)

表3 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相关因素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单因素					多因素				
	β	S.E	t	P	OR(95%CI)	β	S.E	t	P	OR(95%CI)

性别 (以男性为参照

变量	单因素					多因素				
	β	S.E	t	P	OR(95%CI)	β	S.E	t	P	OR(95%CI)
组)										
女性	0.57	0.26	2.24	0.025	1.77 (1.07 ~ 2.93)	0.49	0.28	1.75	0.081	1.62 (0.94 ~ 2.80)
民族 (以汉族为参照组)										
少数民族	0.22	0.39	0.57	0.568	1.25 (0.58 ~ 2.67)	0.33	0.42	0.80	0.423	1.40 (0.62 ~ 3.17)
在读学段 (以本科为参照组)										
大专	-1.75	0.38	-4.60	<0.001	0.17 (0.08 ~ 0.37)	-1.44	0.40	-3.63	<0.001	0.24 (0.11 ~ 0.51)
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 (以否为参照组)										
是	0.45	0.35	1.27	0.204	1.56 (0.79 ~ 3.11)	-0.02	0.38	-0.06	0.950	0.98 (0.46 ~ 2.07)
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 (以否为参照组)										
是	0.58	0.48	1.21	0.226	1.78 (0.70 ~ 4.53)	-0.39	0.55	-0.71	0.479	0.68 (0.23 ~ 2.00)
专业 (以非理工农医为参照组)										
理工农医	-0.33	0.26	-1.26	0.207	0.72 (0.43 ~ 1.20)	-0.25	0.28	-0.89	0.371	0.78 (0.44 ~ 1.35)
家庭经济状况 (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为参照组)										
当地平均水平或以上	0.52	0.33	1.57	0.117	1.68 (0.88 ~ 3.22)	0.38	0.36	1.06	0.291	1.46 (0.72 ~ 2.93)
父亲学历	0.50	0.11	4.43	<0.001	1.64 (1.32 ~ 2.05)	0.37	0.15	2.44	0.015	1.45 (1.08 ~ 1.96)
母亲学历	0.38	0.11	3.60	<0.001	1.47 (1.19 ~ 1.81)	0.09	0.14	0.63	0.529	1.09 (0.83 ~ 1.44)
年龄	0.02	0.09	0.24	0.812	1.02 (0.85 ~ 1.22)	-0.01	0.10	-0.11	0.911	0.99 (0.81 ~ 1.20)

3.3 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以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为因变量的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 在读学段、父亲学历为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的影响因素, 相较于在读学段为本科的受访者, 在读学段为大专的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相对较差 ($P < 0.001$, $OR=0.16$, $95\%CI 0.07 \sim 0.34$), 父亲学历水平越高, 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越高 ($P=0.007$, $OR=1.52$, $95\%CI 1.12 \sim 2.05$); 以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为因变量的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 在读学段、父亲学历为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的影响因素, 相较于在读学段为本科的受访者, 在读学段为大专的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相对较差 ($P < 0.001$, $OR=0.24$, $95\%CI 0.11 \sim 0.51$), 父亲学历水平越高, 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越高 ($P=0.015$, $OR=1.45$, $95\%CI 1.08 \sim 1.96$), 具体详见表 2 及表 3。

4 讨论

4.1 受访者英语听说能力现状

本研究发现, 受访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呈现显著的金字塔式分布结构, 且存在口语能力系统性滞后于听力能力的典型特征^[8]。听力自评达到“好”水平者仅占 21.15%, 近半数 (48.45%) 处于中等水平, 而 30.40% 自评为“差”;

口语能力方面的表现更为薄弱, 自评为“差”者达 40.97%, 中等水平占 44.05%, 仅有 14.98% 达到“好”水平。这种“接收性技能(听)显著优于产出性技能(说)”的失衡结构, 印证了外语教育领域长期关注的“聋哑英语”现象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延续性^[9]。其深层根源在于输入输出机制的断裂——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说指出, 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的质与量不足将直接制约输出能力发展, 而当前中国英语课堂仍以单向知识传授为主, 学生缺乏足量情境化输出实践^[10]。

值得注意的是, 英语听说能力高水平群体比例严重不足。英语听力达“好”者(21.15%)与英语口语达“好”者(14.98%)均远低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高等教育阶段“能有效参与社会交际”的要求(等效 CEFR B2 级)^[11]。这一缺口折射出教学目标的深层偏离: 现有课程体系受应试惯性束缚, 四六级通过率导向导致教学资源向笔试能力倾斜, 老师与学生均对四六级口语考试重视不足, 口语训练被严重边缘化, 这致使中国大学生在国际化学术交流中呈现集体性“失语”。这种能力结构失衡与国家“培养全球胜任力”的战略目标形成尖锐冲突——全球化人才需具备跨文化协商能力, 而当前可能有超 70% 大学生的口语水平难以支撑基础学术对话^[12]。

4.2 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

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显示, 父亲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听力 $OR=1.52, P=0.007$; 口语 $OR=1.45, P=0.015$), 而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未达统计显著性。这一差异本质源于家庭代际传递的性别化资本转化机制。

首先, 结合中国家庭常见的“严父慈母”结构性分工模式^[13], 父亲往往在资源配置与外部社会连接中扮演主导角色, 其高学历更易转化为可制度化的教育资源与实践平台。例如, 父亲的职业网络可能带来国际实习、外语竞赛等“制度化实践场域”, 直接提高子女的英语应用机会和语言实践频率, 从而提升其听说能力。

相较之下, 母亲教育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学前阶段的生活化文化惯习渗透。母亲的高质量语言陪伴(如双语绘本共读、日常会话引导)对学龄前儿童语言发展具有奠基作用, 建构“语言敏感性”与“语用兴趣”, 但该效应可能集中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 在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阶段呈现场域适配性衰减^[14]。加之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结构, 母亲积累的文化资本(如语音敏感性培养、跨文化兴趣启蒙)更倾向于转化为情感支持与学习态度培养, 因难以转化为高校所需的制度性认证资本(如学术交流证书、国际竞赛奖项), 其影响力被结构性弱化。

父母教育影响的差异化格局印证了布迪厄资本理论的预见性: 文化资本向子代能力的转化效率取决于资本形态与受体场域的符号匹配度^[15]。父亲的教育资本更可能外显为可迁移的制度性凭证(职业平台、国际认证资质), 天然契合高等教育场域对标准化能力的考核需求; 而母亲的教育资本常内化为情感性惯习(学习态度塑造、审美品味培育), 在强调实证能力的大学环境中遭遇符号贬值。这要求后续研究构建双轨观测体系: 对父亲教育聚焦资源可及性指标(如国际课程密度、实践平台参与度), 对母亲教育则需开发互动质量量表(如元语言意识培养频率、批判性对话深度)。这也提示当前高校英语教育改革应重点建立低学历父亲家庭学生的制度性资本补偿机制。

4.3 在读学段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

两个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均显示, 在读学段为大专的受访者其英语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均低于本科受访者(听力 $OR=0.16, P<0.001$; 口语 $OR=0.24, P<0.001$)。这一差距本质体现我国高等教育分层机制——本科院校通过高考分数筛选吸纳更优质生源^[16]。高考英语成绩作为高校核心录取指标, 直接反映学生语言基础差异^[17]。同时, 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资源投入、师资配比及国际交流机会显著优于专科院校, 进一步扩大既有能力鸿沟^{[18][19][20][21]}。

4.4 研究优势与局限性

研究优势方面, 本研究首次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CGSS2021)探究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对高等教育阶段英语听说能力的差异化影响, 填补了既有研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实证空白。在理论层面, 创新性地解构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双路径传递机制——通过区分听力与口语能力作为独立因变量, 并分别检验父母教育水平的独立效应, 提出了父亲教育资本通过制度化资源转化(如国际实践平台)、母亲教育资本通过生活化惯习渗透(如语言互动质量)的差异化作用路径假说, 为破解“聋哑英语”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机制性解释。方法学上, 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系统控制性别、院校层次、高中背景等八类混杂因素, 确保父母教育水平净效应的可靠性; 同时将父母学历重构为符合中国教育分层特征的五级变量, 显著提升类别解释力与本土适配性。

研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 样本规模受限($n=227$), 尤其父母高学历组(本科及以上父亲占 10.57%, 母亲占 8.81%)样本量较小, 可能导致统计检验力不足, 对母亲教育水平未达显著性的结论需谨慎解读。其二,

英语听说能力依赖自评数据,存在主观判断偏差风险;未来研究可结合标准化测试(如英语四六级口语成绩)或情境化行为评估提升效度。其三,未控制学生个体语言学习投入(如课外英语接触时长)及高校教学因素(如英语课程类型、外教比例)等变量,后续需进一步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父亲教育水平对在校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则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本科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显著优于专科大学生。这一结果提示,家庭中父亲的教育背景可能通过特定途径(如获取更优质的语言教育资源或机会)对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听说能力发展产生关键作用。

基于制度化与生活化路径对英语能力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本研究提出以下实践建议。第一,高校端精准支持,建议高校构建“家庭文化资本识别机制”,通过学情档案识别低学历父亲家庭学生,为其补足专项语言实践资源,如提供“国际学习实践基金”或参与“跨文化沟通训练营”的机会等,补偿其制度化资源劣势。第二,家庭端功能强化,倡导开发家长端语言教育 App 或数字平台,引导母亲等主要陪伴者通过“影子教育”模式(如陪听英文音频、共读新闻播报)提升家庭隐性语言输入频率,延长母职教育资本的影响周期,为子女打下扎实的听说基础并激发兴趣。第三,政策端结构优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加大对中低文化资本家庭的普惠性外语教育资源投放,拓展农村与中小城市区域学生的数字英语应用平台接入,避免英语能力分化进一步固化社会阶层差异。

参考文献:

- [1]何莲珍.新时代大学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J].外语界,2019,(01):8-12.
- [2]谭远发,王恬,周云.英语听说能力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来自 CGSS2013 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17,(10):122-132.
- [3]袁晓云.城乡中学英语教育差距的对比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4]张慧玉,吴婷.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国民英语能力历时比较研究[J].外语界,2020,(06):70-78.
- [5]刘国辉,张卫国.中国城镇居民英语能力的经济回报率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06):108-114.
- [6]郑妍妍,周昕,吴书瑶.全球化与学英语的回报——来自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06):95-104.
- [7]祝伟,刘松,王瑞梅.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 CGSS2021 数据的实证研究[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4,42(03):689-697.
- [8]高永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2):71-78+146.
- [9]黄志成,潘建平.中日韩三国“哑巴英语”教育状况的因素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1,38(08):5-8.
- [10]罗禹涛.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1(27):59-61.
- [11]刘建达.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J].中国外语,2019,16(03):1+11-12.
- [12]黄雯怡.基于全球胜任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路径探析[J].中国大学教学,2023,(12):56-62.
- [13]景春兰.发展权视角下夫妻财产知情保障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05):121-128.
- [14]杨帆,张义宾,周兢.中国家庭母亲语言输入特征及其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3):68-76.
- [15]刘永兵,赵杰.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外语教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社会学视角[J].外语学刊,2011,(04):121-125.
- [16]李芳.新中国高考公平 70 年:国家意志与个体发展有机统一之路——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19,7(06):25-37.
- [17]乔辉.高考英语改革的进展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8,38(03):126-131.
- [18]钟艳.试谈专科英语教学向本科英语教学的三个转变[J].西昌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4):68-70.
- [19]刘宓.分级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的影响[J].学理论,2010,(15):229-230.
- [20]游雅婧.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J].大众标准化,2020,(04):225+227.
- [21]李小艳.影响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因素及对策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4,(19):125+127.

The Effe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on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2021

Wen-li Yu^{1#} Yu-yao Niu^{2##} Yi-nuo Wang³ Pu Ge⁴ Ming-xiao Zhang⁵ Qi-yu Li⁶

¹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²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³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⁴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⁵Weifang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Weifang 262500, China

⁶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Methods: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21, 227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elected.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employed,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ethnicity, education stage, high school background, university tier, major category, an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levels were separately analyzed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o assess their association with father's and mother's education levels.

Results: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OR=1.52, $P=0.007$) and speaking abilities (OR=1.45, $P=0.015$). The impact of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istening: $P=0.822$; speaking: $P=0.529$).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OR=0.16, $P<0.001$) and speaking abilities (OR=0.24, $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inferior to undergraduates.

Conclusion:Higher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whil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shows no significant impact. Undergraduates outperform college students in both abilities.

Keywords: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CGSS 2021; University student.

#These authors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Corresponding author.